

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「簡約公屋」迎難而進

銳評

卓偉

立法會昨日討論「簡約公屋」撥款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日前與反對在啟德世運道建「簡約公屋」的立法會議員見面時承諾，選址於5年使用期屆滿後會交還發展局作長遠商業發展用途，又引述與會議員指「啟德居民不反對簡約公屋政策」。何永賢早前在電台節目更形容，「簡約公屋」是為快速幫助劏房居民的「救生艇」，並強調8個選址得來不易，別無他選。

民之所求 堅定不移落實

對於「簡約公屋」的討論其實應該聚焦兩個方面：一是劏房戶問題如何解決，反對「簡約公屋」人士有何短期內解決劏房問題的「高見」？二是香港已經撥亂反正之後，由愛國者主導的行政立法，如果仍然解決不了民生積弊，又何來由治及興？習主席要求香港「切實排解民生憂難」，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，需要作出很大的投入，需要面對各種阻礙和困難。

香港的民生問題盤根錯節，任何的改

革必定觸及各方利益，但既然特區政府將「簡約公屋」視為房策的重點，既然社會都認為劏房戶問題必須解決，這樣在「簡約公屋」問題上更要迎難而進，造價問題、選址問題都不應是阻止「簡約公屋」的原因。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講過：「一個自由社會若無法協助大多數的窮人，便也無法保障那些少數的富人。」解決民生問題，是香港長治久安的基础，香港各界都是責無旁貸。

政府斥資264億元建造的「簡約公屋」，最大的爭議有兩方面：一是造價，二是選址。在造價上，「簡約公屋」平均每單位的成本較傳統的公屋還要高，而且只使用幾年，因而被質疑成本與效益不相符。「簡約公屋」成本較傳統公屋貴，這是毋庸置疑，問題是如果可以興建傳統公屋，難道政府會捨傳統選簡約？就是因為傳統公屋興建需時，地皮也不是可一蹴而就，加上各種土地平整、基建、工程等，無5年以上不可能完成，因而才要興建造價較高的「簡約公屋」應急，這不是最好的選擇，但卻是短期紓緩劏房問題的唯一

方案。

有人說200多億元興建「簡約公屋」貴，但派發一萬元消費券就花了政府600多億元公帑，為什麼這些人不出來反對派消費券？香港的基建本來就貴，如果花200多億元，讓3萬戶逾十萬名居於劏房人士能夠改善居所，讓政府有更充裕的時間大量興建公屋，這200多億元何貴之有？況且單位幾年後會拆，但周邊的基建卻可保留，200多億也不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既然消費券可以幾百億元的投放，為基層投入200多億為什麼不可以？政府不是沒有錢，為什麼拿來支援香港最需要照顧的人群，卻遭到這麼多人的反對？

至於選址問題，其實不只是「簡約公屋」，凡是公屋的興建都不會受到周邊居民歡迎，私樓人士擔心影響樓價，就是同屬資助房屋的居民，也不希望太多人湧入影響生活，這是人之常情，也是人性使然。現在「簡約公屋」多個選址都在市區，這其實是汲取了過渡性房屋「同心村」的教訓，如果選址太過偏遠，不少市民可能寧願繼續居於劏房，始終不少人也工作，

而工作大多在市區，「簡約公屋」如果選在偏遠地區，確實可以減少一些地區上爭議，但因而令入住率偏低，相反市區的「簡約公屋」卻一位難求，同樣會造成大量浪費，因此「簡約公屋」盡量選在市區也是無可厚非。

當區居民不滿可以理解，特區政府除了做好解釋之外，也可以在社區規劃作出一定補償，但卻不能因為一些居民「別在我家後院」(Not In My Back Yard-NIMBY)的心態就退縮，這樣如果其他區居民照辦煮碗反對，是否整個「簡約公屋」政策都要停止？是否所有公屋都不再興建？

多做解說 消除市民誤解

「簡約公屋」這個原意甚好的政策結果引來這麼多的討論，再次說明香港房屋問題盤根錯節，任何房策都會引起各種骨牌效應，不是原意好的政策就一定能夠得到支持，不是沒有反中亂港勢力在立法會上拉布攪局，政府的政策就必定可以推行順利，尤其是觸及不同界別利益的問題，

更需要慎重。在政策推出前夕，應該有更好的部署，做好宣傳講解，民情疏導，90名立法會議員都是愛國者，特區政府在推出政策前更應與他們有更好合作，令政策更能落地，而不是政策出台前夕才匆匆「知會」議員。

最重要的是，特區政府必須擇善固執，迎難而進。為什麼房屋等問題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？就是因為這些問題觸及各方利益，任何改革都必定影響既得利益者，必然會面對各種阻力、游說、施壓，過去由於泛政治化的原因，又或是擔心在立法會上面對各種阻撓，很多時候寧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說好的改革往往就無疾而終。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，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，目的不是為了讓愛國愛港力量「分田分地」，坐分議席，而是希望扭轉泛政治化、民粹歪風，更好地支持配合特區政府推動民生改革，切實排解民生憂難。這次「簡約公屋」正是一個明顯例子，既然政府認為政策有利基層，就不應有任何猶豫，全力推動落實，還基層一個安居之所。

資深評論員

提升香港文化水平和實力



議論風生

胡恩威

文化安全是文化繁榮最基本的土壤，構成文化安全其中一個威脅就是「反智文化」。港英時代的香港，文化藝術只是一種消閒娛樂活動，英美西方流行文化價值獨大，狗仔隊小報模式佔主流，導致香港社會文化浮誇、反智風氣氾濫，情況嚴重。回歸後，在一些低俗傳媒文化推波助瀾之下，進一步助長了這種情況。所謂「反智文化」就是只有情緒反應，沒有深思熟慮，沒有大局思想，只考慮一時情緒之發洩而缺乏深層次思考。任何社會，「反智文化」都是敵人。

文化安全是重要議題

要改變這種現象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強引導，尤其要注重分析和應用研究。文化政策應用研究十分重要，這也正是香港所欠缺的，香港未來應當加強這方面的工作。回顧過去，香港雖然曾經做了幾份藝術教育研究，但研究做完之後就束之高閣，完全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，也沒有交代如何跟進。文化研究做得好，文化政策落實得好，也就越能保障文化安全。

要提高香港文化安全，必須要重新訂定一套策略去提升社會認識。香港社會過去存在「反智文化」的情況，如何作出改變？這必須要政府進行有力的引導，先要建立一個文化自信、文化自主的體系，才能構成文化安全。有了文化安全，才能夠讓文化可以真正多元發展。

「反智文化」體現在幾個方面，例如忘本、不尊重知識、喜歡追求一窩蜂，以簡單膚淺的娛樂為主流，任何不配合這個方程式的都會遭到排斥。香港作為

一個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，比很多北歐國家如丹麥、挪威還要大，然而，北歐文化重質不重量，但是香港整體文化重量不重質，缺乏中華文化為本的底氣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很多人只喜歡情緒反應，不喜歡反思反省，只看重數目字上的排名以及數量，對於質並不重視和理解，只要比西方排名高、數量多便可以。當然，這類現象和香港單一經濟結構有關，因為一個產業多元的社會，是需要多元人才，需要複雜和重視團隊的能力。其實，這類現象所導致問題也需值得高度重視，因為越是「反智文化」盛行的地區，外部勢力也就越容易操控影響當地的民意。

香港藝術文化一面倒親西方，當然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港英時期親西方是理所當然。但回歸以後，親西方的模式是需要調節。可惜香港低俗文化獨大，基本上都是吸收西方最低俗的流行文化，高深的思想文化在香港並沒有落地生根。所以整個社會缺乏文化自信、不能文化自立、也沒有文化自主的能力。而長期以來，香港的文化政策、資源分配和布局，大多只是舉辦活動，未能真正做到能力建設和文化建設。

香港未來文化發展必須要建基於幾個大原則：第一是「一本多元」的宗旨。「一本」是以中華文化為本體。而中華文化為本體更應該有深層次。香港的「本」就是以中華文化和嶺南文化為本；「多元」就是多元的文化。

第二，文化是語言。語言決定文化，在語言政策上，英文是國際語言，但中文、普通話不單止是國際語言，亦是國家法定語言。所以普通話、英文、廣東話三者必要找到一個相互促進和發展的格局，但其核心應該以中華文化語言為本，因為失去了這個文化核心，便會出現很多文化安全的根本性問題。

第三是傳媒。語言就是文化，文化

就是語言，語言反映出思想。以往的低俗傳媒帶動了一種低俗的語言風氣，用詞用字充滿語言暴力或低俗思想。社會的低俗文化其實很正，並不是問題，但當低俗文化獨大就是一個嚴重問題。過去香港文化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低俗文化過分獨大，缺乏真正多元。

第四是文化市場。一個七百多萬人口的社會，應該有一個健康的文化市場和文化活力。嚴肅文學、網絡文學、詩歌、其他藝術模式均應該有着一定合理的數量。以往香港社會存在的問題是，一些人一窩蜂喜歡刺激、「爆穀式」膚淺的項目。一些比較深層次思考性的被邊緣化被排斥。

「一本多元」兼容並蓄

香港和國家血脈相連。香港居民的上一代都是來自內地，潮州人、上海人、福建人、山東人……來自祖國的西湖四海。而香港又與世界各地廣泛溝通，所以香港是一個包含多元文化的城市。香港要推動文化向更高層次發展，應該着力推動「一本多元」的宗旨，唯有如此，香港才能真正融入國家發展，也才能真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貢獻力量。

提升香港整體的文化水平，是一個系統工作。本屆政府新設立的文化體育和旅遊局需要在這一方面落墨做功夫。在財政資源、空間資源、人力資源等方面，除了要解決西方英美獨大這個問題外，更應建立一個能夠和內地相對接的體制。

「十四五」支持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位，要實現這一目標，就需要兼容中西文化，發揚中西文化，同時香港也肩負推廣中國文化的重任。說好中國故事，也就是說好香港故事。這方面，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各界，任重道遠。
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
「旁聽師」作威作福 政府須果斷執法維護法治

新聞背後

韋名

據了解，警方上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拘捕一名男子，涉嫌在法院內拍片及拍照。由於當時時近「初選案」開審，又再度令人關注起「黃絲」中所謂「旁聽師」企圖滋事，擾亂法庭秩序，干預案件審訊的可能性。

這不是第一次有「旁聽師」被捕，去年4月，警方國安處拘捕前「職工盟」副主席鄧建華等6人，涉嫌在各級法院滋擾擔任修例風波案件的外聘檢控官，干犯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」罪。雖然自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根本徹底落實後，反中亂港勢力在議會、街頭，已再無立身之地。但這不代表他們就會乖乖就範，一些人轉而向法院入手，將法庭當作其政治表演的新舞台，「旁聽師」、「送車師」等等的新角色，便應運而生。

擾亂法庭損害司法獨立

修例風波案件開審以來，這些「旁聽師」就不斷濫用旁聽聆訊的權利，不只隨意在法庭高聲交談、呼喊，甚至在證人接受律師盤問時插口干擾；又曾有外聘大狀向法院解釋證人出庭問題時，有「旁聽師」大嗌「阻住法庭時間」。更有甚者，審訊期間法官、控方還遭到人身攻擊以至「起底」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屢有人攜帶攻擊性武器試圖闖入法庭，雖然最後都沒有演變成嚴重事件，但上述情況已值得各方警惕。

可以看出，這些所謂「旁聽師」的真正目的根本就不是單純的旁聽，而是盡一切可能阻撓法庭審訊，這不

只是個別的藐視法庭行為，更損害香港的司法制度，也對其他真心前往旁聽的公眾，以及案件中的所有持份者不公平。最近「初選案」開審，又再次有大量的「旁聽師」到場。警方上周拘捕的該名男子，難保不是預先到場「踩線」的「哨兵」，就如黑暴期間一樣，先助「勇武」了解「戰場」情況。

參考外國經驗提高罰則

對於這類意圖損害香港法治的情況，警方必須依法追究。當然，可見反中亂港勢力會將之抹黑成「政治打壓」，但要強調的是，即使是西方，也不會將藐視法庭、干預案件審訊的行為視為公民權利，甚至可能從很多人的標準看來，西方國家的刑罰比起香港要更重更嚴。2009年，美國一名男子只是在旁聽期間大聲打了一個哈欠，就被視為企圖干擾司法程序，隨即被控藐視法庭罪而被判入獄半年。

對比之下，本港如果侮辱法官、證人、出庭的法庭人員，或有意阻撓訴訟程序，經公訴程序最高也只是被判罰款5千元和判囚兩年。早前就有法律界人士指出，有關刑罰明顯不足，甚至建議最高刑罰應訂為終身監禁及無限額罰款，以助香港維持世界頂尖的司法及法律制度。

「初選案」的審訊無疑得到各界關注，因此更不能容許其受到任何程度的干擾或妨礙。不只警方需要加強執法，依法追究這些試圖阻撓法庭審訊的「旁聽師」，政府亦有必要考慮國外例子和經驗，在必要時候作出修例提高阻撓力，保護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法治地位。

芯片業哀鴻遍野 美政治操弄惹眾怒

國際觀察

宇文

近日，隨着包括英特爾、三星、AMD以及高通、德州儀器在內的全球芯片巨頭相繼發布財報，業界發現，全球芯片巨頭紛紛「爆雷」，哀鴻遍野。

率先引爆芯片行業第一顆雷的是巨頭英特爾。英特爾公布2022年四季度及全年業績顯示，其四季度業績未能達到市場預期，大幅下滑32%，創下2016年以來最低季收入。高通發布2023財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，實現營收94.56億美元，同比减少12%。

存儲芯片市場，情況更為嚴峻。三星電子2022年營業利潤同比大降69%，海力士、美光等公司利潤也大幅下滑、紛紛公布減產和縮減開支計劃。

芯片產業怎麼了？從美國到歐洲，從韓國到日本，紛紛獨自或聯合建立半導體聯盟，形成芯片產業的全球主導優勢，釋

放出來的是芯片產業前景廣闊的戰略信號。而且，疫情期間出現的「芯片荒」也顯示芯片的供不應求。此一時彼一時的風雲變幻，恰恰折射了芯片產業背後的市場邏輯，即市場供求規律。然而規律可循，但又難以避免。

失去中國市場「芯難安」

客觀而言，國家層面的半導體戰略基於偏離市場規律的大國博弈，會對芯片市場帶來無法控制的擾動，甚至會導致地緣政治因素下的芯片產業的重組。譬如，美日荷三國達成向中國禁售先進半導體生產設備的半秘密協議，會引發三國芯片巨頭的市場調整，導致芯片巨頭焦慮和業績下滑。失去中國大市場，也導致供給側的芯片市場收縮。再如美國促使三星、台積電在美建廠，也會失去中國這個龐大的芯片消費市場。政治因素下的芯片市場萎縮，

芯片庫存難以消化，芯片供過於求，價格自然下滑。

疫情期間「芯片荒」，導致供不應求，市場趨利因素下，芯片巨頭加大芯片供給。市場不是靜止的，趨利驅動調節供需關係平衡同時，也加速市場波動。芯片巨頭去年財報尤其是四季度業績大幅下滑，表明芯片市場處於供過於求的周期中。市場供需理論，是人人都知的經濟學常識，芯片巨頭走不出市場供需周期律，並非不懂經濟學，而是走不出經濟人理性的怪圈。這是市場規律的平詭之處，作為市場主體，無論是中小企業還是芯片巨頭，都擺脫不了「身在廬山」的資本逐利本性。

當然，疫情導致全球經濟下滑，產業鏈和供應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。芯片產業，也難以獨善其身。

消費低迷，尤其是主流消費品的消費動能疲弱，是芯片產業哀鴻遍野的主要原

因。汽車和智能手機是芯片大戶，兩個產業消費下滑，前端芯片銷量也好不到哪去。新能源智能汽車產業方興未艾，和科技創新的節奏同步。未來一段時間，汽車芯片消費或有波折，但穩增長應是主調。由於新能源智能汽車需要相對高端的芯片支持，這個產業的競爭未來也會白熱化。不排除某些國家或集團會在智能汽車芯片上實行「單邊主義」，造成汽車芯片市場的動盪不安。

美違背市場規律必遭反噬

智能手機市場呈現疲態，從而影響上游芯片產業業績下滑。數據顯示，2022年，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創下了10年來最低水平，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為12.1億部，較上一年下降了11.3%，這是自2013年以來的最低出貨量。作為智能手機產銷大國，2022年第四季度，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出貨

量約7292萬台，同比下降12.6%。縱觀2022全年，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約2.86億台，同比下降13.2%，為有紀錄以來最大降幅。

智能手機消費低迷，除了全球經濟不景氣和通貨膨脹的宏觀因素，還有以下原因：市場飽和，換機周期加長；技術發展遇到瓶頸，新品創新不足；5G推動作用低於預期，缺乏新的殺手級應用；產品質量越來越好，性能過剩等等。

除非智能手機技術上有革命性變化，智能手機產銷將陷入沉悶低迷期。靠智能手機市場激活消費產業，顯然不切實際。芯片技術存在差異，芯片產業必須遵守市場規律。然而，當芯片產業變成大國博弈的工具，芯片市場被政治滋擾，芯片巨頭也難以寫寫暢意的市場敘事。

中國人民大學重慶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